

最近,“幸福指数”这四个字,好像花生米一样,到处被炒得热气腾腾。大至国家,小至个人,都在喧嚷嚷地谈应该如何提升幸福指数。

所谓的“幸福指数”,简单地讲,就是对生活的满意度。

许多人总爱把“幸福指数”和经济能力挂钩,然而,有一回,翻阅一本杂志,一名矿工的访谈却给我留下了铁打铜铸的印象。

矿工从事的是危险度极高的挖矿工作,额上和脸上,皱纹深如沟壑。当访问问他生活里最大的憧憬是什么时,笑言霎时好似从地底冒出的水一样,深深地渗透进每一条长长短短的皱纹里,他说:“我每天最期盼的,便是妻子手中的那一杯温水。”

原来他的妻子每天都会在他收工前赶来,提着一个保温瓶,静静地站在矿坑口,等。一旦邈里邈邈的他拖着满身疲惫从矿坑里爬出来时,他的妻子便会适时地从保温瓶里倒出一杯水,递给他。就是这一杯水,温暖了他的身子他的心,解除了他满满一天的疲劳,给了他继续下去矿坑工作的勇气和活力。

矿工的话,给“幸福”二字下了最完美的定义。

幸福指数

(新加坡) 尤 今

最近,有一张照片,在网上疯传,唤醒了许多人沉睡着的感动。

照片拍的是一名清道夫,在完成了打扫街道的工作后,坐在街边的石墩上,把稚龄女儿放在自家膝上,双手捧着粉嫩的脸蛋儿,额头抵、鼻碰鼻,脸上绽放着足以让冰霜溶化的灿烂笑容。

人民网如此评论——

“当他放下简陋的清洁工具,将孩子抱于膝上,欢乐如泉水一般自动流淌,劳动的疲惫在这一瞬间化为烟云。幸福与亲情,成了对普通劳动者最美的慰藉,这是草根阶层的生活底气,是希望,是未来。保护草根的幸福,于一个飞速发展的转型中国而言,是眼下最大的社会责任。”

人民网把个人的幸福指数和国家挂钩,由点而及于面,由浅处向深处挖掘,而且,还将“保护草根的幸福”看成是国家的一种责任和发展目标。

的确,保障国民的基本温饱,使老有所依,小有所靠,是确保全民幸福指数最起码

的条件。

在“幸福指数”这码事上,我觉得冰岛人最能说明问题。

冰岛岛自然生存环境极端恶劣,一年只分冬夏两季,冬长夏短,夏天有昼没夜,冬天有夜没昼。农耕不利,只能靠波涛汹涌的大海生活。偌大的国家,人口才30余万。最近,当我以旅人的身份踏上冰岛时,原以为会有一堆堆愁眉苦脸的人恣意往我双耳倒垃圾,然而,没有想到,我见到的,竟是一张张快活的笑脸;我听见的,竟是一串串自豪的话语。贫富均衡的生活使犯罪率几降于零,而全国普及的教育又使冰岛人出了应付各种危机的高智慧。尽管这几年碰上了使国家几乎濒临破产的经济风暴,可是,心理力量坚韧的冰岛人却说:“怕什么呢,总会过去的”



呀!”

我到过的一个非洲国家刚好相反,瘪着肚皮的国民,常常在熬过了一个痛苦的漫长黑夜之后,发现等在面前的,竟然又是一个看不到希望的暗夜;一个又一个、一个接一个,绵绵无绝期;因此呀,那里的人是与“幸福”二字沾不上边的,在“幸福指数”排行榜上,常常列于末端。他们不是不想让幸福的阳光照进心坎里,问题是:他们根本看不到太阳在哪里呀!

2011年11月26日,在台湾新竹灯火辉煌的大厅里,正举行第4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颁奖典礼。四位最佳女配角提名的人围者——刘嘉玲、蒋雯丽、惠英红和我都带着各自的心情等待那一瞬间。“获得最佳女配角的是……唐群。”主持人的话音落下,我站起身来。哦,无心插柳哦……我边走边想走上台去,手托金马奖杯,我说:“此时此刻无论是谁站在这个领奖台上,我都会一样激动,一样兴奋。今天我只是个幸运儿,我心里满满装的是感恩和感谢。我感恩于台湾导演邓勇星先生为我创造《到阜阳六百里》中谢琴这个独特的角色,他为我打开了另扇窗户,而这股清新空气正是我所需要的。我是学音乐出身的。七八岁就上台唱歌,从南京小红花艺术团考入上音附中,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,是歌剧演员……”这自我介绍着实让观众和媒体出乎意料,因为在四十八届金马奖获奖者中实在鲜有音乐人捧回。

在我多年的舞台实践中,除了歌剧《白毛女》《江姐》《货郎与小姐》《芳草心》等近十个女主角外,还在各种文艺演出中任主持人,拍电影电视,任一些企事业单位的艺术指导,排练合唱及指挥,在大学艺术系任教,搞配音,当评委……虽有些许作为和成绩,可在心里仍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强烈愿望——在银幕形象上有个大突破,摒弃以往驾轻就熟的类型化表现手法。打碎一个自我,重塑一个新我。

真是老天有眼,机会来了。在电影《到阜阳六百里》中我饰演一位安徽来上海做生活的钟点工谢琴,是一个湮没在社会底层的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,是个接地气的活生生的人,是个和我本人反差极大的角色。我兴奋极了。机遇和挑战并存!对“唐群这张脸能演钟点工?”等等质疑声,我充耳不闻。我一头扎进这个人物环境中去,力所能及地接触外地来打工的人,去感受他们的所思所想,说着安徽话和剧组所有演员做生活小品。什么化妆、服装、拍摄角度全抛在脑后了。拍摄中自己不断挑刺,警惕“犯病”,每每得意时即毫不犹豫地自我泼冷水,寻找更佳方案,潜下心来在规定情境里真实生活着。在一场弄堂里吵架的群戏中,为了房子的归属问题“我”和五六个人评理。导演为了真实,决定不排练,一声“开始”,骂声叫声,脸盆扫帚噼里啪啦横扫过来……这些群众演员热情高涨,管你什么台词不台词,声嘶力竭,大打出手。我更是豁出去了,不顾撕破了衣服退无可退地被挤到一垃圾桶边上,爬进去抽出一根竹竿,“嗖”地从天上劈下……拍了三遍后,群众演员大呼“哎哟哟,过瘾过瘾”。我已脸色煞白,差点背过气去,躺在地上看着他们扬长而去的身影,昏头昏脑地琢磨着:关键词被湮没了,大家的状态倒是真实的。而这样的心境延续到紧接着的下一场戏(已经拍过),那就应该是……我猛然意识到:那场戏谢琴不应找人哭诉,必须忍之又忍地把苦痛心酸全都吞下去,泪水是不能留给别人看的。要想在这个城市扎下去,我这双手没有时间抱着脸哭。要去找活!干活!没有活干那才是天塌下来了。一种与人物共呼吸的感觉抓住了我。我爬起找到导演:“拍完的那场戏不够准确,我想重拍。”“好!”

金马奖评审团主席张艾嘉对我这样评价:“唐群以内敛诠释角色及表演浓度,令人难忘而轻易胜出。”这句话对我来说实在是比得到金马奖还珍贵。我正在朝着颠覆自己的目标迈步。金马奖使我学习到了对艺术的纯粹态度,这是一种更加吸引我的纯粹。

活在这一带的潘先生,说20多年前为复兴南路,把瑞安街切为两段,那么就到另一段看看吧。然而,穿过复兴南路,另一段也没找到蛛丝马迹。无奈之下,我们只好俾俾离去。回到房间,上网查了一下,方知拓展马路时,瑞安街309巷就改为23巷了。再看下去,23巷17号是瑞安街警察派出所,这说明瑞安街不

短,即使找到了,若没有门牌号码,也很难确认梁实秋故居究竟是哪一处。于是,马上给梁文蔷去信,想了解准确位置。她回信说,父母告诉她:安东街那所房子一卖掉就被拆掉了,盖高楼了,面包树当然也砍掉了。梁实秋到台湾后最初的三个住处,就这样,只剩下一座云和街故居了。

另一种纯粹

唐群

我演《到阜阳六百里》

寻找梁实秋在台北的另两所故居

闻黎明

他们迁入新居,这才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安身乐园。

安东街的房子,是梁实秋全家所有盖起来的。关于它的兴建,梁实秋在《悼念故妻程季淑女士》中说:地皮不大,仅130余坪,图样是自己设计的,计划是“房求其小,院求其大,因为两个人不需要大房,而季淑要种花木故院需宽敞”。对于室内设计,则务求适合两人需要,程季淑不愿意打扰梁实秋的工作,又不愿与他终日隔离,于是设计成“一连三间房,一间寢室,一间书房,中间一间起居室,拉门两套虽设而常开”。这样,梁实秋在书房抬头便能看见起居室内的妻子,妻子坐在中间起居室,可窥察四方一切动静,照顾全家所有需要,真正成为一家之主。

云和街故居揭幕时,院中的面包树是人们热议的一个话题。那棵树的确让人留恋,搬到安东街后,小时候我们那一代人玩的游戏,主要是打弹子、斗虫、刮刮片和飞香烟牌子。以前一包香烟里有一张香烟牌子,小囡要白相,没有这么多香烟牌子,做生意的人门槛很精,印一大张一大张地卖,我们买回来,就用剪刀一片一片地剪开来。现在条件好了,我女儿买了四房两厅两卫,叫我们老夫老妻搬过去住,我们去住后,觉得不习惯。为啥呢?邻居都像陌生人一样,见面也不打招呼。天天待在新房子里很冷清、寂寞,所以又搬回德里里住。尽管房子老,但是生活了几十年,熟门熟路熟人,很亲切,很有感情。



下了飞机,其实已经疲累。在机上睡不着,机舱里有个小孩,应该是身体不舒服吧,不停地哇哇哭,心里也不好埋怨,只是觉得他可怜。

据说小孩比大人敏感得多,飞机升空和降落时刻,速度和高度的转换,会让人耳朵尤其不舒服,可是,迟钝的大人已经失去敏锐的感觉,偶尔觉得有轻微的耳鸣,小孩却敏感而无法以话语说出口,唯有用不

程季淑亲手种植了一棵。1972年,留居西雅图的梁文蔷担心父母年迈,企盼父母移居美国,好就近照料。女儿的恳请加上国际形势变化,促使梁实秋夫妇决定卖掉房子,于5月26日重新来到梁实秋1923年留学美国时登岸的西雅图。在西雅图,程季淑还怀念着她手植的那棵面包树。梁实秋是1903年阴历腊八出生的,1973年1月11日也是阴历腊八,这天梁实秋填了一首词,把那棵面包树镶嵌了进去。词云:“恼煞无端天未去。几度风狂,不道岁云暮。莫叹旧居无觅处,犹存墙角面包树。目断长空迷津渡。泪眼倚楼,楼外青无数。往事如烟如柳絮,相思便是春常驻。”

梁实秋的生动文笔,让人闻之心动。世上真再巧不过的事了,带我去德惠街的潘邦正教授,婚后就住在云和街,而且是9号,与住在11号的梁实秋只隔一堵墙。更巧的是,潘教授小时候是在安东街度过的,所以一听到我想去安东街,马上说那一带他太熟悉了,还说安东街多年前就改名为瑞安街,现在知道安东街的人已越来越少了,如果问别人,说不定就指到现今的安东街了。

有汽车就是方便,我们很快到了瑞安街。可是,我们拐了两圈,从这头走到那头,只见到有个“安东市场”,却没有309巷,一直到了和平东路大街,巷口最大的门牌也不到200号。潘先生见我有些不甘心,于是把汽车掉过头,再走一次。自小生



易碎·小心轻放

大耳

断哭泣来表达。

听到有不耐烦的人在低声咒骂,更加同情小孩失语的痛苦。生命中有许多事情皆有口难言。对着不停转动的行李输送带,等待自己的行李箱出现,突然看见有个箱子,外边包扎紧紧,还打了黄色的绳结,并贴上数张红色标签

纸,写明“易碎·小心轻放”。不知道为什么瞬间浮上来的一句话竟然是:“这难道说的是爱情吗?”

有的爱情有口难言,也有的爱情是易碎,必需小心轻放。可能就是易碎,放的时候要轻一些,要更小心些,所以才难言吧?生活中胡乱凑起来的零碎感觉,更大可能是无意中流露出来的真正心情。



浴马图 (中国画) 韩敏

邢家桥南路的德里里一共有7条横弄堂,每个横弄堂有5个门牌号,德里里共有35个门牌号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,市政改造拆掉了1到9号,所以现在是10到35号,据说1到9号两排石库门,是日本人造的,大门很小。我家大约是1950年左右搬来的,当时同住的有我的爹娘和两个哥哥。整幢房子是用条子顶下来的。

我们石库门有小卫生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装了煤气。住在德里里的大多数是职员,条件还可以,每家人家都住一幢房子。据说德里里的房子,是由一个开建筑营造厂的姓李的老板建造的。他有两个儿子当时也住在这里,每人一幢。

当年的政府,曾叫李老板去造提篮桥监狱,他家里反对说,造监狱是作孽,会有报应的。后来他的大儿子竟然莫名其妙死了。德里里原来有一口水井,后来堵死了。解放前,我们德里里18、19号还办过小学;解放后,29号开过居民食堂和作为冬防委员会的办公场所。德里里的石库门一般面积不大,通客堂21平方米,二楼通楼也是21平方米,亭子间6.8平方米,再加上晒台、卫生间和灶披间。

德里里的居民一般不打听东家家长西家短的底细,可能跟他们的职业和文化素养有关。弄堂口没有烟店。买东西要走一段路,到四川路上去买;买菜到虬江路菜场。以前家里有客人来,都到德里里旁边的三八饭店吃饭,价廉物美。现在三八饭店没有了。我们弄

堂里不少人家,当时就有无线电收音机,个别人家还有电话、沙发。“文革”期间乱套了,到我们弄堂里来抢房子的人,抢得很凶。现在许多房子都不是一家独住了。比方讲22号原本只住一家,现在住了三家——客堂间一家、通前楼一家、亭子间一家,十五六个人住在一幢房子里,螺蛳壳里做道场。由于公用面积不够用,搬来的人家没地方烧饭,一般由房管所来测量和划定地方,有时难免会吵架。

弄堂里小商小贩不多,可能是靠近四川北路,买东西较方便。天热的时候,弄堂里的人到四川路、虬江路一带去乘风凉,晚上虬江路竹榻躺椅一排一排的,都是附近的居民。

小时候我们那一代人玩的游戏,主要是打弹子、斗虫、刮刮片和飞香烟牌子。以前一包香烟里有一张香烟牌子,小囡要白相,没有这么多香烟牌子,做生意的人门槛很精,印一大张一大张地卖,我们买回来,就用剪刀一片一片地剪开来。现在条件好了,我女儿买了四房两厅两卫,叫我们老夫老妻搬过去住,我们去住后,觉得不习惯。为啥呢?邻居都像陌生人一样,见面也不打招呼。天天待在新房子里很冷清、寂寞,所以又搬回德里里住。尽管房子老,但是生活了几十年,熟门熟路熟人,很亲切,很有感情。

(葛建平、刘莹整理)

十日谈

石库门生活口述

明日请读一篇《隔壁是提篮桥监狱》